

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与教训

施雪华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091)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了许多的成功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反思。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坚持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结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神圣化地看待马克思主义,不恰当地解读马克思主义,非理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教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94(2013)01-0047-06

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中国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60多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巨大发展的60多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思想建设、实现思想指导、思想武装和理论创新的主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功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反思。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新世纪新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

1.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运用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有形式而概括出来的。他说:“‘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邓小平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解放思想”的要求。他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全党同志解放思想、摆脱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在充分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重大意义基础上,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143}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科学完整地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再次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指出“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2]277}。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第一次科学阐述了解放思想的含义,他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279}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一次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功绩,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高度阐述

收稿日期:2012-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对策研究”(07&ZD035)、北京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学科带头人)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与模式研究”(107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施雪华(1963—),男,浙江嘉兴人,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主任,法国巴黎一大政治学博士后,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与公共政策、比较政党政治研究。

解放思想,并强调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2]364}

在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江泽民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强调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3]87};“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335};“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3]339}。

胡锦涛在多种场合和多次讲话中继续强调解放思想对于实现新世纪新阶段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2007年,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是突出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4]。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综括来说,从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到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到以江泽民、胡锦涛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充分说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精髓。正是确立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确保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

2.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包括: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群众化的工作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关心群众生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几方面内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

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敌人都可以战胜。他还强调指出,进行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就会使领导的认识更加正确、更加生动、更加丰富。正是毛泽东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确保了我国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与新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宝库增添了崭新内容。把生产力的基础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起点上统一起来,并始终不渝地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鲜明特色。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融汇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武器直接交给人民群众,从而使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积极性火山般地迸发出来,形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精神力量,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独特创造。把生产力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融为一体,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人民群众实际利益不断满足的基础之上,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重要方法论原则^[5]。总之,邓小平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方面形成的特色鲜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重要经验。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个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2001年,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80年来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和执政的考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勤奋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

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6]。关注民生问题成为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点,这是对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新的继承和发展。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持实干富民、实干兴邦,敢于开拓,勇于担当,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慵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反映群众呼声,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 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7]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最根本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这两者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在回应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挑战过程中,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解释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框架: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毛泽东继续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创造性地传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实践哲学的智慧,科学地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中心问题,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的理论突破。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具有深远意义,是因为它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历史性革新,破解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共产党人执政史上的“世纪性难题”,初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理论框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沿着毛泽东、邓小平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了关于矛盾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实践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新实践相结合,科学地分析和判断世情、国情、党情,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了系统的理论分析、战略规划和策略设计,全面勾画了建设这一历史性目标的宏伟蓝图,进一步培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意识,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意义深远的历史性转变。

理论与实践、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作为毛泽东破解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哲学智慧,是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变革历程的伟大哲学工具。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运用这一哲学工具,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相结合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高度上对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8]。

4. 坚持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结合

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

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也就是说,实践中的创新推动着理论上的创新。因此,要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推进,就必须坚持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有机结合。

毛泽东是第一个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实现了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有机结合的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和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9]“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10]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百业待举的严峻形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和全面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实现了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适应当今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3]537}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也是党的理论创新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胡锦涛指出:“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11]他提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进步要求和人民群众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概括,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实践特色;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壤,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敏锐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使当代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总结十年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已经写进新的党章中,成为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还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训

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12]邓小平在谈到“文革”错误时也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3]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邓小平的论述,都突出了当下现实和过往历史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如何从所犯历史错误中汲取教训的问题。胡锦涛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深刻地指出,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遵循这一思路,我们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训进行总结,应该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1. 神圣化地看待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理论界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好像马克思主义囊括了人类文化的全部真理,再不需要其他学派、学说和真理的存在。例如,苏联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中的传统提法将马克思哲学的产生说成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在对这一“变革”的意义进行阐释时,教科书遵循了这样的思考路径: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概括为德国古典哲学,又把德国的古典哲学的最高成果概括为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而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然而这种论证思路却是多有纰漏的。首先,能不能把马克思哲学的“来源”概括为德国古典哲学?其次,能不能把博大而深邃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成果概括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一连串的追问使我们感觉到,当哲学的发展推进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阶段的时候,它之前之后的哲学形态就只具有谬论的性质或反面的意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哲学的唯一形态,而排斥其他理论体系进入哲学领地。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尊和美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4]。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也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给后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中国选择了苏联这个当时别无选择的样板。虽然在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强化了中国特色,但基本目标等几乎是苏联模式的翻版。这一弊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初已经察觉,毛泽东适时提出“以苏为鉴”,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此后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终究没有冲破苏联化模式构筑的坚固堡垒。这样,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苏联化模式的态度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移植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初步反思再到后来又不自觉地重新回归的过程^[15]。

2. 不恰当地解读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要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全面地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应用马克思主义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经世致用的特点,表现在有些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为我所用,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即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进行片面性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述进行断章取义式的解

读。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不止于此,还有一些同志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错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把一些错误观点强加给马克思,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这种用错误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的实践曾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错误理论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反而显得有“理论依据”。加上有的东西又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或得到毛泽东支持和批准的,这就更显得有“权威性”和“真理性”。因此,在“左”倾抬头时期,存在着用错误理解的马克思的理论作为其政策依据的事实^[16]。

3. 非理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中华前现代文明固有经世致用、修齐治平等实用性特点,与西方现代文明爱智求真、崇尚精神信仰的科学理性并不相同。随着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特别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熏染、洗礼和冲击,带来了科学理性精神^[17]。这种精神同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葆有、吸纳和具备。

但是,这种精神特质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遭到重大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与之相对立的反科学、反理性倾向。这种倾向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暴露出迹象。当时为了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全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知识分子中开展了一系列批判改造运动,在凸显政治性、正义性同时,对批判的科学性以及对其活动内在规律明显忽视,这些缺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进一步膨胀并扭曲发展。从鳞次栉比的浮夸“卫星”、眼花缭乱的各种“大办”以及对“条件论”、“有限论”等的批判中所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是对科学的践踏和对理性的蔑视。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政治性批判狂潮,日渐滋长的对党的领袖的盲目崇拜以及对现代迷信的宣扬,反科学、反理性倾向得到发展,大有衍化为强劲社会思潮之势,极大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反思能力^[15],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受挫的一个主要因素。

4. 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教条。但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我们一度犯了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突出表现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运用上。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非常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但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教条化的倾向,即不顾我国形势的发展变化,继续坚持传统的观念,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57年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反复就是一个例证。当时,本来动员全党以学习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开展整风运动,因出现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攻击,而从整风转向大规模的右反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过于严重估计形势,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反右扩大化并没有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判断上的失误,反而认为抓了阶级斗争激发了人的积极性,促进了1957年经济建设上的增长。故而,毛泽东重新对阶级斗争作理论上的概括。他把“左”倾错误观点上升为系统理论,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之前。后来这个论断被称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作“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这条基本路线,毛泽东就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深陷误区而不能自拔。从此,他把阶级斗争作为一切问题的纲。这样不但完全抛弃了八大正确的论断,而且问题愈来愈严重。他把阶级斗争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思想政治领域;从社会上扩大到党内;从一定范畴扩大到整个历史阶段。结果是,在十年动乱时期,全国武斗不止,生产停顿,经济滑到全面崩溃的边缘,损失约5 000亿元;至于大批干部遭受迫害致死致残,造成冤假错案,以及党的思想混乱,难以用数字计算。同时期的世界和周边国家、地区,经济正在起飞,日本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的,我国却在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内乱不休,从而拉大了我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的差距。这是十分惨痛的历史教训。^[18]

以上分析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极为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十分惨痛的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和未来我们的执政党更加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大大提升执政能力,对于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科学地认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积极参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来,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4]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 [5] 包心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 [6] 余品华.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规律——从井冈山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3).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 [8] 刘敬东.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经验[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2).
- [9]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
- [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1.
- [11]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3-07-02(3).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2.
-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2.
- [14] 杨永庚,门忠民.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经验及其教训[J].陇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 [15] 姚宏志.建国后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和经验[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 [16] 卫兴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背景与学报发展的新机遇[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
- [17] 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6-147.
- [18] 钟家栋,王世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26-329.

[责任编辑:刘建明]

本刊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理论探讨》编辑部